



## 清华香肠

大家小絮

张克澄

清华人讲究吃由来已久，清华的香肠好吃也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。

据说上世纪二十年代中，清华国学院成立，杨步伟随夫君赵元任入住清华园。杨本身是医生，大家闺秀内外兼修，出得厅堂入得厨房，做得一手好菜。她联合几个太太合资在清华园开了一家“小桥食社”饭店，由于饭菜可口得到众人称赞，尤其是其自制的香肠，独特的配方脍炙人口，吃过的人无不流连忘返。杨步伟为人豪爽，小桥食社里常常传出她爽朗的笑声，“稀客，稀客，今天我请客！”一时，食客盈门。

没过几个月，在杨医生的“豪爽”下小桥食社因经营亏损关门了，但真材实料、风味独特的香肠却传了下来，成为清华园美食的代名词，从此流传。

至三十年代，梅贻琦掌校后，发表著名的重师轻楼之语，礼贤下士，广揽名师，清华之学术，逐渐在国内外有了佳评。随着学校地位上升，校中同仁

中有人开始表现出对他人的不屑。其时，清华因庚款的缘由，本就财大；学术水平上升后，难免气粗。

梅贻琦做人素来低调，见此情形，便告诫同仁要谦虚谨慎。所举例子，便是清华香肠。梅说，清华香肠好吃，清华人都知道；须知大街上也有卖香肠的，我们不必到处去宣传，外人在尝过清华香肠后便知清华真正的味道。

父亲1947年进入清华时就听说了这个典故，觉得妙不可言。

梅贻琦是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先后办了三所联合大学，由北大、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历尽艰辛，筚路蓝缕，在边陲之地昆明成为一所闻名中外的大学。其他两所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半途而废，何也？盖因人难和。

西南联大之三校，有国立私立之分，经费来源不一又常常不能及时到位。这中间，清华财

源充足人员整齐，三位常委又只有梅贻琦长驻昆明主持校务。梅若计较起来，这摊子有一百个散伙的理由。人称寡言君子的梅贻琦，并没借机大卖清华香肠，而是放低身段，少说多做，一切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三校一碗水端平，把个联大办得像一家人，无分你我。

无独有偶，蒋南翔1952年底回到母校当校长，院系调整已近尾声，清华除几个工科系外，数理化生文史，几个叫得响的学科院系，都已分出去了。蒋南翔痛惜晚来一步。

但他没有抱怨，更没有放弃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，建立前沿专业和系培养国家急需的工程师和未来的科技领军人物。到1958年，无线电系、自动控制系、工程化学系、工程物理系和工程力学数学系先后建立起来，填补了国家在国防前沿领域人才稀缺的空白。同时他结合自己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经验，在学校建立辅导员制度，走又

红又专理工结合的道路。

1960年前后，院系调整后的大学毕业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，经过五六年学习的清华毕业生表现如何？蒋南翔极为关心。

调查得知：清华学生上手快、动手能力强，听话、出活，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。说明学苏这几年，加强实习比重、安排学生下工厂工地实际操作和真刀真枪作毕业设计，收到了积极效果。同时也有反映，个别清华学生骄傲、自满，难管理。这种情况引起了蒋南翔的高度重视。他开始在不同场合强调，清华人要注重和周围同事搞好团结，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，不可贩卖清华香肠！

他告诫同学：到了新单位，不要急着亮清华牌子，要放下身段，虚心向老同志、工人师傅学习。真要是有本事，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那时知道了你是清华毕业生，你就给母校争了光，那时候清华因你而骄傲。你就是清华香肠！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毕业生，绝大多数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，让全国人民逐渐认识到清华香肠的妙处。也有的人因缘际会转行，进入新的领域。校友吴邦国和吴官正本都是技术革新能手，先当本厂技术科长后提升为技术副厂长，在技术副厂长岗位上展现出解决问题敢担当的领导才能，被上级发现，继而转入更

高的领导岗位。曾任司法部长的自5届毕业生张福森曾笑对我说，当年若不是汪家礽极力动员他服从工作需要转行，留在七机部搞技术的话，以他的水平，一直干下来，应该也是个院士了。

说到底，清华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摇篮。

清华在“一二·九”和文革后出了一批领导人，外界因此有人把清华说成是抗大，是党校，是培养领导人的地方。何东昌说这种认识是误解也是对清华的歪曲。

父亲到旧金山湾区参加清华校友聚会时，逐个询问在场校友的经历和成就，问他们作为清华香肠在美国有多吃香？台湾新竹校友初闻此言大感兴趣，追问缘由。父亲就此介绍梅蒋二位校长注重内修、低调做人、高调做事的一贯作风，并借题发挥说时代不同了，清华香肠不仅要内香，而且也要外香，要让世界都知道清华香肠的妙处。

金国藩当了系主任后，请教父亲如何做好工作？父亲给了他一句话：作清华系主任，要敢为人先！金说，张先生的这句话极大地鼓舞了他。要勇于创新，不拘于现状，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后来工作能顺利开展，科研走在前列，全靠这句话。金还说，这句话直到今天都是系里的准则之一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过增元去德国作访问学者。这是文

革后中国派往西德的第一批访问学者。经过多年闭关锁国，西方和中国互相不了解，西德教授没把这个中国来的“讲师”放在眼里，未安排研究内容，指着书架上的一排书让他随意读读。

这堆书里不仅有学术著作，还有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。

过增元认真拜读该论文，发现其中一个错误，为慎重起见，他反复推演，查阅相关文献，最后确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教授确实是错了。

怎么办？说还是不说？过增元想起了临出国前父亲对他的嘱咐：

“到了德国，最重要的是自信。德国人非常讲究实事求是，你认为是对的，一定要坚持，要敢于和德国人争论！”

过增元带着结论走进了教授办公室。几十分钟辩论后，教授坦承，这确实是个从未被发现的错误。第二天，教授郑重地宣布一项决定：延长过增元的访问期限；同时，作为感谢，个人赠送他一份礼物。过增元怎么也没想到，教授送他的礼物竟然是回中国探亲的往返机票！

大礼堂草坪前日晷上刻的“行胜于言”，被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奉为圭臬，塑造出特质。

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。

新时期清华人，是与时俱进、营养丰富的上品香肠么？请读者诸君证之。